

操之忠，漢之賊也：論《三國演義》 曹魏人物之「忠義」評價*

曾世豪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論文聚焦於《三國演義》中，曹魏麾下而獲得正面評價的忠義人物。在小說「擁劉反曹」的基本敘事傾向，為蜀漢鞠躬盡瘁如趙雲、關羽、諸葛亮，或者棄暗投明如黃忠、嚴顏、姜維等，自然受到了小說家及評點者的讚揚，但是為曹魏出生入死，是否也能擔得起「忠義」的稱許？值得探究。例如第6回，曹操脫離盟軍獨自追擊董卓失敗，險難中為曹洪所救，贊評認為：「曹洪者，操之忠，漢之賊也」，如何理解「忠操」與「賊漢」之間的道德角力？像這樣的舉止在古代正統觀下，到底應該怎樣評判？類似的人物，還包括典韋、許褚、張遼、龐德等，都是「士為知己者死」的貫徹者，其行為只能歸類於「為虎作倀」的狹隘道德牢套之中嗎？小說家紀錄其人的故事，並獲得了「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的歎喟，背後似乎隱藏著某種春秋之筆，則「人臣」（操之忠）與「從賊」（漢之賊）之間，其道德光譜亦頗有值得推敲之處。本論文探討曹魏人物在原作、評點及後世讀者接受之「忠義」評價，如何對「善／惡」疆域產生衝擊。

關鍵詞：《三國演義》 曹魏 忠義 善惡 評點

* 拙文為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擇惡固執：四大奇書道德邊緣人物研究」（編號：MOST 108-2636-H-152-002）之部分成果，投稿期間蒙諸位匿名審稿委員惠賜卓見，幫助筆者進一步修正謬誤，謹致謝忱。

操之忠，漢之賊也：論《三國演義》 曹魏人物之「忠義」評價

曾世豪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三國演義》^①寫漢末之亂局，其中魏、蜀、吳三家雖皆宣稱要匡扶炎劉，但卻先後黃袍加身，自然引起了正統／僭國的道德批判。此所謂「帝魏寇蜀」或「擁劉反曹」之爭論，自《三國志》、《漢晉春秋》、《資治通鑑》、《通鑑綱目》等史乘起即聚訟不已。^②而在今日通行最廣的小說版本（毛宗崗父子評點，以下簡稱毛評）中，則是於〈讀三國志法〉之破題，便確立了「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於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的褒貶基調。^③

魏、蜀人物之忠奸，也成爲了批評者眼中的道德教材。如蔣大器〈三國志序〉：「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讀到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

①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筆者按：此版本即毛宗崗評改本（以下簡稱毛本），是今日較具影響力之版本。

② 可參考楊建文：〈還「仁德」在《三國演義》中的地位——兼及跨世紀《三國演義》研究走向的思考〉，《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1996年），頁92。

③ 見（清）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收於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正文前頁5。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評點原文，包含毛評、李漁評點（以下簡稱漁評，此版本正文簡稱漁本）、李卓吾評點（以下簡稱贊評，此版本正文簡稱贊本）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至於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會評本，正文前頁 24-25）。又如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④上述諸說，皆以曹操為賊奸，以劉備為帝胄，形成善惡分明之壁壘，但對於其中的模糊之處，例如隸屬曹賊麾下的忠臣／忠義，他們雖是「操之忠」，卻同時是「漢之賊」——蔣大器或張尚德並未告訴讀者，面對這些群體應當如何來「思」，怎樣去「師」？

學界對於《三國演義》道德評價的理解，有承繼了明清評點觀點，認為蜀漢為忠義之代表，曹魏則是奸佞的一方，並聚焦於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等主要人物身上來闡釋。^⑤也有論者試圖檢討這樣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往往另闢鬆動蜀漢陣營無瑕形象的蹊徑。較早提出的如魯迅的名言：「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⑥夏志清、浦安迪（Andrew H. Plaks）也挖掘書中的對關羽、劉備、諸葛亮等人的反諷筆墨，形成翻案式的理解進路；^⑦甚至有走得更遠的，直指小說根本是「明反曹，暗反劉」，^⑧劃定了道德上另一個極端的楚河漢界。而另一種可見的觀點，則是維持「擁劉反曹」無可撼搖的板塊，但承認若干曹魏人物實具有「忠義」的品格。^⑨

-
- ④ 收於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4。
- ⑤ 如吳國聯：〈以忠孝仁義為核心的封建道德觀的頌歌——《三國演義》主題再探〉，《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70-74；胡悅瞻、鄢洪峰：〈道德與政治之間——再論《三國演義》的政治思想〉，《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31卷第2期（2011年3月），頁55-58；聶春豔：〈論《三國演義》的道德化人物形象及其成因〉，《小說評論》第S1期（2013年），頁98-100。
- ⑥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0。
- ⑦ 詳見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77-123；（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5年），頁397-500。
- ⑧ 陳傳席：〈明反曹，暗反劉——《三國演義》內容傾向新論〉，《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00年），頁46-64。
- ⑨ 如關四平以劉備、諸葛亮、關羽為仁、智、勇的典範，並提到蜀漢英雄光明磊落、曹操出爾反爾，試圖建立道德上的對立關係，但提到了曹魏陣營的辛毗、張遼、張郃、徐晃時，也承認他們具有「忠義」的道德高度。見氏著：《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94、206-214及289。

就以上諸說來看，無論延續傳統立場，或是提出其中「似是而非」的成分，大多集中於書中要角，對於兩大陣營中次要人物較少關注。部分論者雖然留意到了曹魏「忠孝節義」之人物，但並未進一步說明，這些具有良善秉性的忠臣，為什麼會與獐惡的逆賊為伍，至死不渝，這些人的選擇到底是道德的昇華或墮落？小說家或評點者如何為其選擇提出道德批判？他們還是「忠孝節義必當師」的對象嗎？又小說中，有部分人物游移於正統與反叛的陣營之中，又該如何安頓其人的道德位置？筆者即針對此尚可發揮之處提出管見。

本文聚焦於「忠義」評價。關於「忠義」一詞的出現，據論者考察，在先秦典籍中「忠」、「義」並無聯綴之用法，二詞被同時使用始於東漢前期，可說是獨尊儒術、儒家道德內涵盛行後之事。分而言之，忠是忠於君主（下對上），義是信於友朋（同級間），有時兩者是統一的，但也常有偏義於「忠」或「義」單方面的情形。正史中的「忠義」通常強調臣民對朝廷的忠誠，特別是《金史》、《元史》、《明史》編纂後，中央集權強化的階段，而民間更傾向於鄉里親朋之義。¹⁰《三國演義》即屬於元明付梓的作品，書中的「忠義」確實更強調於「忠」的一面，只是效忠的對象是中央抑或地方，則各有不同。然而，無論「忠義」的內涵如何隨時代不同而變化，必是正面的評斷。所以當小說家或評論者在曹魏人物身上使用「忠」或「義」一類的辭彙時，便顯得令人玩味。

此外，從《三國演義》原作到評改本，甚至各家評點之間的「評價」皆不盡相同，¹¹而正是在意識型態的角力之中，讀者可以看到多重道德光譜的呈現，讓「善惡」的解讀充滿更多可能。談小說之「評價」問題，用意並不在於還原「原

¹⁰ 以上詳見秦翠紅：〈中國古代「忠義」內涵及其演變探析〉，《孔子研究》第5期（2010年），頁58-62。

¹¹ 如第18回「夏侯惇拔矢啖睛」展現了非常的魄力，但贊評認為：「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節，史官津津道之，陋矣。」（會評本，頁224）又第75回「呂子明白衣渡江」寫出呂蒙秋毫無犯，就連取箬笠遮雨的同鄉將士亦不護短，毛評則以為「此非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奸處」（會評本，頁924），這些觀點不見得是小說家安插相關情節的本意。毛評且強化了「擁劉反曹」之意識，其旨在恢復古本，尤其針對俗本及贊評唐突昭烈、謾罵武侯（如劉備殺劉封、諸葛亮上方谷燒魏延等）之語進行修改（見〈凡例〉，會評本，正文前頁20-21）。

作」之旨趣，更多的是人物塑造與閱讀接受之差異，且自明清到現代，各自呈現迥異的面貌。如此一來，儘管小說持明顯的價值意識（擁劉反曹），但在個別人物的書寫上，勢必會構成多重的關照與理解，進而形成善與惡之間的鑲嵌作用。且在不同時空環境之下，讀者的閱讀反應也各異其趣，具有多元的討論空間，這當是這部奇書的藝術價值所在，也是筆者立論之基礎。

於此前提下，以下筆者將以「忠臣」或「忠義」稱呼某些曹魏人物，這些評價的給予，有些來自不同陣營的書中角色，如曹操、關羽曾分別稱許褚、張遼是忠臣／忠義，有些則來自評點者或當代學者的意見（詳見後文）。職是，下文將會以小說內容為主（毛本為主，其餘版本為輔），適當時候援引史實中的狀況來參照，並較多地借鑒於毛評、漁評、贊評之看法，作為理解文本的嚮導，若是評點者未及之處，亦會參酌學界意見來補充，為《三國演義》曹魏人物的「忠義」評價進行論述。以下先就擇「惡」者的道德依據出發。

二、良禽擇木而棲：擇「惡」之道德依據

《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手下兵多將廣，從第5回寫「應募之士，如雨駢集」（頁37）開始，此刻加入的以夏侯惇、曹洪等親族為主；第10回寫「操在兗州，招賢納士」（頁84），這時荀彧、程昱、郭嘉、典韋等骨幹漸次薈萃。相對於劉備桃園三結義、三顧茅廬，曹營初期的君臣遇合寫來十分平淡，作者並未特別說明曹操為什麼吸引了海內才俊的加入，並成為三國文武最盛的一方。

其實，曹操被稱為「奸雄」，亦即道德上雖有虧損，但是卻具有卓越的才幹，這是其睥睨天下的勝處。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曹操能夠獲得英傑青睞，也是有其依據的。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指出，曹操擔任兗州牧是受到獻帝認可的，這使得其在地方的權力被普遍接受，而非董卓、呂布、李傕之流的軍閥或賊寇，且與袁紹、劉表自矜於士族身分的人不同，曹操願意和將士們一起浴血奮戰。¹²曹

¹² （澳）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67-68。

操在經濟上也提供了顛沛流離者的安頓，這落實在屯田制度上，讓包括許褚這樣帶著宗族投靠的人有了足夠的棲身之所，並讓這些追隨者獻出自己的忠誠。¹³另一方面，曹操作為建安文化的領袖，樂於網羅文人、興建圖書機構和太學，這些都大大增加帝國大族的敬重。¹⁴

儘管上述作為在小說中被輕描淡寫的帶過，¹⁵不足勾勒成一幅聖主的肖像，但不管怎麼說，曹操看起來是有資格被忠義之士列入「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的選項的。況且曹操一開始又何嘗不是忠臣呢？如孫啟祥注意到了，第3回詩贊「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的「忠臣」指的正是曹操。¹⁶又第4回曹操自言：「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間圖之，為國除害耳」（頁34），這番告解，連反曹最深的毛評也認為：「曹操此時竟是一位正人」（會評本，頁47）。

不只曹操，後來投效其麾下的賈詡、徐晃一開始也是獻帝認可的忠臣。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楊琦密奏：「臣觀賈詡雖為李傕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頁111），獻帝因此泣向其求援。¹⁷亂軍中，楊奉派徐晃救駕，其驍勇讓獻帝印象深刻，特別問：「適斬賊將者何人」，並「慰勞之」（頁113）。像這樣的人後來轉投曹操，從本質上來說，評點家不以之為「惡」。徐晃在第14回被滿寵勸降，因感念楊奉恩情不願殺之，贊評稱「徐公明是個好人」，漁評稱「善人也」，毛評也說「公明真義士」（會評本，頁164）。此刻的徐晃與曹操，不管怎麼看都

¹³ （澳）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136-137。

¹⁴ 同前註，頁211、288及321。

¹⁵ 如第48回說到劉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頁423）；第66回又提到曹操「興設學校，延禮文士」（頁587）

¹⁶ 孫啟祥：〈也說《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塑造〉，《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39卷第1期（2018年1月），頁9。

¹⁷ 伍大福曾注意到賈詡忠於漢室卻又投曹的形象，見氏著：〈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37卷第9期（2016年9月），頁9。不過其對於賈詡幾經擇主，但並沒有背上惡名的判斷，稍可商榷。毛評便認為：「賈詡初隨李傕，後隨曹操，雖有智謀，不知順逆」。（會評本，第23回，頁282）

是「真社稷臣也」的組合¹⁸——曹操轉為漢賊是後來的事。¹⁹從毛氏的批評：「聽荀彧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為曹侯，則有似乎順」（會評本，正文前頁6），亦可知其形象帶有某種曖昧性，呼應第56回的詩贊：「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頁490）。所以，對於賈詡或徐晃這些一開始心向漢室的人，效忠的對象到底是周公或王莽，而自己又應該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的確是艱難的考驗。

張磊夫還提到，雖然曹操和獻帝都對彼此不滿，但他們還是捆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這使得朝廷上無可避免地醞釀著忠誠的衝突，臣僚們也分為三股力量：始終跟著獻帝流亡的官員、效忠曹操的私屬、抱著傳統忠君報國理想卻準備侍奉當今真正的統治者的士人。²⁰在小說中，曹操漢相的身分確實具有號召力。第23回賈詡選擇歸順曹操的原因之一是：「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頁205）。同一回中還發生一個小插曲：劉表猶豫於要與袁紹或曹操交好，派韓嵩赴許昌觀望，韓嵩說道：

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復為將軍死矣。（頁208-209）

後來韓嵩確實接受了曹操／天子的任命，因此被劉表囚禁（但他堅稱「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直到第42回曹操入主江陵後才被釋放。像韓嵩這樣的小人物，凸顯「抱著傳統忠君報國理想」者擇主的困難。儘管實際上授予官爵的人是曹操，但畢竟是以天子名義發出的，這讓忠臣進退維谷，就連「義絕」之關羽也不得不

¹⁸ 這是獻帝一開始對曹操的評價，見第14回，頁118。

¹⁹ 對於曹操由忠臣到奸臣的變化，可參考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17-129。

²⁰ （澳）張磊夫（Rafé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92及100。

以迂迴的方式屈膝，接受「漢壽亭侯」之封誥，遑論其餘。²¹毛評在第 25 回針對關羽「降漢不降曹」發表評論：

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為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會評本，頁 303）

曹操位居大漢丞相的身分，確係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捋髯俯視著降漢、降曹、忠漢、忠曹不同志趣的才彥，也讓這些人看上去似無分別。²²東漢末年的人才流動，實有其時代上的不得已性，亦即「王綱解紐」，喪失了中央的核心標的，唯有依附於地方諸侯。投降曹操的人面臨道德困境，於是只能嘗試在史冊中尋求典型在夙昔的依據。

熊篤注意到，小說中出現的「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等自解之語都出自孔子。²³既然連聖人都不免周遊列國，待價而沽，建安英俊的浮萍漂泊似乎難以苛責。然而，「良禽擇木而棲」的說辭最多是減輕罪惡而已，要進一步為自己的行為找到道德的立足點，還需要更強烈的歷史形象來支撐。

²¹ 如陳登曾對呂布罵道：「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第 19 回，頁 171）贊評也說：「陳登父子最為忠義，其智謀又為餘事矣，其殺曹操之心，即殺呂布之事也。」（會評本，第 21 回，頁 265）但在第 24 回曹操、劉備決裂，曹操大軍壓境情況下，陳登並未死義，而是拱手獻上徐州。

²² 關羽義弟張飛因此曾與之發生齟齬。毛評曾說：「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為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為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會評本，第 28 回，頁 341）

²³ 熊篤：〈從《三國演義》看「忠」的觀念的沿革演變——《三國演義》倫理觀縱橫談之一〉，《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0 年），頁 57。孔子說法的原文，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及《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所引《家語》。小說中「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正是滿寵說降徐晃的說辭。

第 25 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曹操為關羽「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的條件感到為難，這時負責聯絡雙方的是張遼，其云：「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頁 222-223）張遼是關羽所認可的「忠義之士」，驍勇善戰，本來是呂布部下，但在白門樓歸順曹操。張遼雖降，但不全是毛評所謂「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的人物，他曾經痛罵曹操是「國賊」（第 19 回，頁 178），也提到關羽若戰死有「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頁 222）的罪狀，可見其心中並非毫無炎劉的存在。

那為何張遼仍選擇效力曹操呢？關鍵是其所提到的豫讓「眾人國士」之論。豫讓是春秋時晉人，曾為權臣智伯器重，智伯死後不惜「漆身吞炭」報仇，最後事敗自刎，並不因主公的道德有虧而不思回報。豫讓以「國士報國士」的故事被寫入《史記·刺客列傳》，太史公並有云：「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²⁴成為忠臣的楷模。

張遼援引豫讓之例子，不只是要說服曹操，也在給自己的改節行為下一註腳：為以眾人待我的呂布殉身固然是「忠義」；但活下來為以國士待我的曹操流盡最後一滴鮮血，是更有價值的「忠義」——其中仍有鴻毛泰山之別。²⁵正如夏志清所說的：

《三國》裡的人物並不都像關羽這般關心名譽，但即使是那些次要的英雄，也立意要名垂青史。……沒有嶄露頭角以前，人人可以投效新主，但一經決定專事一主之後，他們為了榮譽，便會至死不渝地效忠下去。²⁶

毛評對豫讓「眾人國士」之論的態度可以討論。在第 29 回江東許貢暗通曹操事發

²⁴ 豫讓事蹟及論贊，詳見（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 年），卷 86，頁 1024-1026 及 1033。

²⁵ 趙伯陶曾注意到《三國演義》對豫讓「眾人國士」之論的看重。見氏著：〈困惑中的憧憬——《三國演義》的人才理想與作者心態〉，《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1990 年），頁 90-91。

²⁶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92-93。

後，被孫策絞殺，此時有家客三人報主行刺，重創孫策，被剝為醢；小說有詩贊：「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為奇」（頁 256）。毛評云：「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為人臣而忘其君者」（會評本，頁 357）。另說：「義哉三客！勝徐晃、張遼輩多矣」（會評本，頁 359）。

儘管毛評本來對張遼說法不置可否，但在此則鄭重肯定豫讓之精神，在第 50 回「關雲長義釋曹操」情節中，又提到了「報德者」對「國士遇我」應有的回饋方式（會評本，頁 622）。不過不可忘記的是，許貢正是因為試圖聯繫曹操而被殺，則其屬下門客的死義，是否反過來是對自己「為人臣而忘其君者」的批判呢？至於徐晃、張遼雖遭挖苦，但其舊主如楊奉後與僭位的袁術為伍，並因縱兵掠民而為劉備所殺；呂布更是書中寡廉無義的代表，真要說起來，兩人的殉主／擇主，多少有些動輒得咎的難為。

可以看得出來，在《三國演義》的世界中，對於「忠義」的界定，存在著兩種標準，一種是以忠君愛國為最高評價的「忠義」；另一種則是回應知遇之恩的「忠義」，浦安迪則將這種主人公效忠於朝廷和對個人講義氣之間的徘徊苦惱，化約成「公義（大義）／私義（小義）」。²⁷這兩者有時可以是相得益彰的，例如劉蜀集團作為正統的延續，則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等人的克盡厥職既私又公，但為數不少的情況下反而是矛盾的存在——浦安迪曾如此形容：「過分拘執於義理結果反而會釀成不義的事態」，²⁸說明了「公義」與「私義」不只是層次的不同，而且是善惡評價顛覆的震源。典型的例子是第 9 回「蔡邕哭董卓」一事，

²⁷（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461。事實上，學界對於兩者的稱呼不一，有稱為「儒家正統思想／江湖義氣」的，如趙伯陶：〈困惑中的憧憬——《三國演義》的人才理想與作者心態〉，頁 89；有稱為「史官文化／俗文化」，如劉上生：〈《三國演義》「義」文化心理結構之系統考察〉，《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1990 年），頁 77-78；有稱為「士大夫精英式發言／庶民發言」的，如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53。

²⁸ 同前註，頁 461。

董卓固然是逆臣，但蔡邕卻以知己而哭其喪亡，王允於是下令縊死。評點家在此各有議論，以贊評為例（毛評基本相同）：

今人俱以蔡邕哭董卓為非，是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為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何可概論也？董卓誠為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為過也。……余取蔡之死董者，取其不負知己，非謂其遂不負漢也。讀史者，何可如此拘勢也？（會評本，頁 106）

評者都承認，蔡邕的行為偏離了「不負漢」的道德標竿，但其對於知己的報償仍有可貴之處。尤其「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其實也正是「曹魏忠臣」之所以願意與漢賊站在一起的緣故。這種「眾人國士」的回報與純粹的忠君愛國是截然不同的，證據就在王允堅持處死正著述「漢史」的蔡邕之理由：「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頁 76）《史記》所肯定的內容被譏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王允則稱之為「謗書」，²⁹象徵了兩種南轅北轍的價值取向，但作者也並未以冷峻的態度貶斥之；相反地，讀者可以在蔡邕的身上看到同情的理解。

說到「擇主」的依據，本節最後討論的是「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的荀彧。荀彧在第 10 回即加入曹營，一直是曹操得力的參謀，甚至被稱為「吾之子房」，但在第 61 回因勸諫曹操勿晉魏公而死。荀彧的例子在談論小說中的「擇惡者」時是一個很微妙的存在，其曾以高祖、光武據關中、河內之事比擬曹操，又以許都合於土德為由建議遷都，在贊本中甚至還勸曹操將發動政變的王子服等人滅門（見會評本，第 24 回，頁 302），儼然是「漢之賊」。因此毛評對荀彧並不同情，反而譏刺說：

²⁹ 《史記》評價的問題，可參見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151-238。

荀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為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毋乃為識者所笑？（會評本，第 61 回，頁 751）

正如張磊夫所說的：

曹操和荀彧的動機和真正意圖是模糊且不能確定的。後世的歷史學家們爭論於荀彧是否因對漢的忠心，才在察覺到曹操的野心日益擴大時站到了他的對立面，因而遭此結果——但他扮演的是真正忠心的士大夫角色，還是僅僅因良心上過不去而選擇了拒絕呢？³⁰

筆者認為，討論荀彧「忠漢／忠曹」問題時，僅糾結於其與曹操的關係是很難釐清的，更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如果荀彧確實是忠於漢室的話，為什麼不選擇《三國演義》擁護的正統人選：劉備？耐人尋味的是，荀彧不僅從未考慮過以劉備為匡復漢室的基石，而且三番兩次勸曹操剷除劉備，最典型的是第 14 回獻上「二虎競食」及「驅虎吞狼」之計，要讓劉備及呂布自相殘殺。

從「崇劉黜曹」的道德意識出發，劉備之作為正統雖無疑問，但從小說中一些線索來看，則會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首先，儘管劉備宣稱自己忠心耿耿，但最後卻位登九五的結果，反而最像討董聯盟中的袁術——在所有盟友中，就只有這兩人真正稱帝。不僅如此，劉備在陶謙三讓徐州及曹操煮酒論英雄時，首先提到比自己更適當的州牧／英雄人選都是袁術，恐非偶然，這兩人也常以自己的血統（中山靖王之後／四世三公）自矜。

劉備由「皇叔」而「皇帝」，若要比擬的話，當非毛評第 73 回所謂：「孔明之意非蔑獻帝也，殆欲如唐肅宗靈武之事，尊帝為上皇耳」（會評本，頁 896），

³⁰ （澳）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 327。

而更像對靖難之變的影射。³¹荀彧之死代表了「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的挫敗，或許可說選擇曹操是識人不明的盲目，但其未投入劉備陣營，是否反過來又是另一種真知灼見？與持「良禽擇木而棲」和豫讓「眾人國士」之論自解的「操之忠」不同，荀彧早就知道劉備也不會是大漢棟樑的更好選擇。³²

正如浦安迪對曹、劉、孫相繼稱帝的評論：「其加冕場面的相似重複之感使人們難以分清三個人這麼幹的動機理由究竟有何區別。」³³從這樣的角度重新去思考，不管是哪個陣營，在中央失去凝聚力的亂世中四散各方，最初都是將報國的熱忱投射於看似賢明的領袖身上，但最終卻只能冷眼看著自己的主公由「忠臣」走向「漢賊」，可說是三國「忠義」之士的共同宿命吧？而這也使得小說的「善／惡」標準產生了鬆動的可能，以下論述之。

三、逆臣手下偏有忠臣：善／惡之板塊鑲嵌

作者以曹操為「奸絕」的反派，其麾下人物如華歆被稱是「為操爪牙」（會評本，第66回，頁822）。曹操讚典韋力壯如「古之惡來」，毛評有云：「惡來助紂，果然」（會評本，第10回，頁114），儼然曹魏集團皆「助紂為虐」的奸賊。然而，《三國演義》的奇處正在於善惡評價的搖蕩，如第12回典韋在濮陽火海中尋覓失散的曹操，毛評又反過來稱讚：「典韋三入火城，可謂忠勇」（會評本，頁135），這顯然是肯定其救主於危難的美德，而非針對黨惡的不義。

與典韋一樣捨生忘死的護衛，還有被譽為「虎癡」或「虎侯」的許褚。作者

³¹ 浦安迪：「小說中更關緊要的是『正統』這個核心問題，可以看成是對永樂朝之後的政治現實作出的特別反響；我們知道，小說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成文的。」見氏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456。

³² 擇曹不擇劉的還包括第52回的陳應：「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順劉備！」（頁457）最後這位小人物在有機會苟延殘喘的情況下，拼死對抗趙雲，直到命喪黃泉。可見劉備在書中的仁德並未起到全面性的感召作用。

³³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391。

在曹操棒殺伏后，不臣之罪行達到頂峰的第 66 回，諷刺性地加入許褚盡忠職守，遏阻宗親身分的曹仁接近醉臥的曹操，讓曹操感歎：「許褚真忠臣也！」（頁 590）毛評在此大發感觸：「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為之一歎。」（會評本，頁 824）不啻是對於漢室不得如此「忠臣」的惋惜。下回毛評又進一步闡述：「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會評本，頁 825）

典韋、許褚的例子，讓「善」與「惡」的板塊產生了嵌合的作用。《三國演義》雖然基本上是持「擁劉反曹」之立場，具有明確的價值意識，但在人物描寫上，卻能兼顧道德見解之多重思辨，評點乃至於後世閱讀，也呈現多重觀照的理解，潛藏著多元的討論空間。像是曹操在書中奸險殘暴，但其也痛惡賣主求榮的小人，如苗澤、楊松。相反地，對於忠義之士，曹操卻願意予以褒揚。第 33 回王修哭袁譚，犯了曹操「敢有哭者斬」的禁令，但曹操卻拜之為上賓。王修忠心不改，問其對付袁尙的方法而不答，曹操以為忠臣。

在曹操陣中，投降者多經歷過心理掙扎，如前所述徐晃、張遼、王修等，而荊州的文聘也是。第 41 回曹操盤點隨劉琮歸降的襄陽諸將，獨不見文聘：

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歔歔流涕。操曰：「真忠臣也！」……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頁 363-364）

毛評與漁評都認為文聘「與袁紹之客王修等（相）類」，但漁評追問的是：「然則襄陽與魏延一戰何為哉？」（會評本，頁 520）對於文聘這樣的「忠臣」來說，雖有死戰的決心，自己的主公卻選擇投降，不免愕然；在劉琮、劉琦失和的情況下，對於魏延開城迎接劉備的行為也很混淆。不過，從其受到斥責而羞慚的描寫來看，顯然文聘絕非趨炎附勢之徒。

不只曹操讚賞原屬於不同陣營的忠臣，曹魏人物的寧死不屈，也會反過來獲得蜀漢方面的認可，符合馮文樓所說的，只要是忠義之行，奸雄曹操也好，賢相

諸葛亮也罷，即使作為敵對的一方，都會為之肅然起敬。⁹⁴如第 97 回，郝昭嚴拒斬祥「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頁 863）的招降：

諸葛亮乃我國之讎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為昆仲，今時為讎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第 97 回，頁 862）

郝昭堅守陳倉，讓諸葛亮大吃苦頭，後趁其病重攻破城池，郝昭驚死：「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第 98 回，頁 873）同樣盡忠的魏臣，還包括識破姜維詐降，卻代替曹真被圍自刎的費耀。郝昭、費耀都本著報答國恩的心態赴死，並非見風轉舵的小人，因此毛評、贊評分別提出「惜乎事非其主耳」、「深為費君惜也」（會評本，第 97 回，頁 1187 及 1192）的扼腕——兩人「不順大漢而事奸魏」的選擇，違離小說家或評點者的正統觀，但反而因這分固執而獲得對手、評論的憐憫，在書中呈現出道德的雙面性。

在《三國演義》的世界中，正面的品格可能相得益彰，如劉、關、張之間的「忠」與「義」；有時卻反而產生齟齬，像徐庶因其母為曹操所挾，「忠」與「孝」不能兩全。毛評的看法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既孝子，即安肯為操用乎？」（會評本，第 36 回，頁 451）相對於曹操必須以母要脅徐庶「背順歸逆」，同樣孝母的姜維卻自然而然地「棄暗投明」，因為「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順，則自有君臣之義，正不專恃其母子之情耳。」（會評本，第 93 回，頁 1133）

然而，孝與忠是否有必然的聯繫？第 10 回曹操為報父仇而屠戮徐州，私心逾越公心，雖在第 14 回被獻帝譽為「社稷臣」，但終究露出兇惡的獠牙，以致相繼失去了「孝子／忠臣」的頭銜。對比之下，蜀漢五虎將之一的馬超，看上去「忠孝兩全」，毛評云：

⁹⁴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頁 72。

馬騰為衣帶詔而死，則騰為忠臣；超為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為孝子而亦為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為賊，誤書之為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為得之。（會評本，第 58 回，頁 713）

不過，金文京曾注意到「馬孟起興兵雪恨」情節與史實的出入，以及毛本對於嘉靖本第 64 回馬超被罵「背父叛君」一事的塗改。³⁵可以理解歷史與小說本有不同，但這個「背父叛君」的舊版本痕跡，³⁶仍為馬超的道德高度留下了一個缺口，不能忘記其曾與劉備戰於葭萌關，讓毛評皺眉：「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仇，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會評本，第 65 回，頁 799）如果「孝子」與「忠臣」真能同心同德，又何至於兵戎相向？

如同前文提到劉備帶有袁術的影子，馬超「背父叛君」的舊版本形象則讓人聯想到「三姓家奴」的呂布。馬超雖未如呂布以弑父作晉見之禮，卻同樣以武藝自負，分別對張魯、劉備提出要奪取劉璋州郡為獻——而這竟同時發生在第 65 回，短短 2 回中（第 64 回甫投奔張魯），馬超便輕易地轉換兩次陣營。莫怪乎會先與張飛夜戰、後關羽欲入川比試，³⁷讀者不會忘記呂布也曾攀附劉備，又與關、張充斥著緊張的關係。所以當第 64 回毛評試圖分辨馬超與呂布之異：「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會評本，頁 787），就顯得有些欲掩彌彰。

³⁵ 金文京：「按《演義》敘述，馬超攻曹操是為父報仇，因為先此馬超父馬騰想誅殺曹操以效忠天子，不想卻被曹操害於京城。但按史書記載，馬騰被害卻是因為馬超叛曹所致。顯然，《演義》作者是為抹去後來成為蜀國五虎上將之一的馬超對父親見死不救的污點，並給曹操加上殺害忠良馬騰的惡名，這才對歷史事實作了如上改寫的。」見氏著，邱嶺、吳芳玲譯，李均洋校：《《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18-19。

³⁶ 贊本中楊阜曾以「超等叛君無父之徒」、「汝背父無君逆天之賊」痛罵馬超。見會評本，頁 798。

³⁷ 毛評認為這是要「壓服其心」，見會評本，第 65 回，頁 799。另〈讀三國史答問〉以為「孟起來降，其心未測，不先有以彈壓之，反復未可知也」，在諸葛亮將之與張飛並列為「黥、彭之徒」後，「則孟起野心自化，毋復他慮」（會評本，正文前頁 26），也點出其不馴之志。

馬超「忠孝」品格的不確定性，象徵蜀漢陣營道德純粹性的虧損，而第 64 回與之鼎峙的「操之忠臣」楊阜，則相對嵌入了「善」的板塊。楊阜本是涼州刺史韋康之參軍，馬超來襲時，先勸韋康勿開城投降，後也未因馬超的饒恕而感惠變節，而是暗中與姜敘、梁寬、趙衢、尹奉、趙昂聯盟，而聯盟的促成，與姜敘之母、趙昂之妻的死忠之心大有關係：

敘母聞言，……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想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頁 568-569）

毛評試圖分析其中錯綜複雜的道德光譜：

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庶之母知操之為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為賊，此則其可惜者也。……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幸身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會評本，頁 788）

一般論者在談到《三國演義》中的女性形象，常將心向劉、曹的女性人物，包括徐庶之母、崔夫人、馬邈之妻（以上屬漢之忠臣）、姜敘之母、趙昂之妻、王經之母、夏侯令女（以上屬魏之忠臣）等放在同一道德標準評價，目之為氣節的表

率，³⁸但眾所皆知的是，兩大陣營實為是非天平的兩端，勢猶冰炭。在毛氏眼中，敘之母及昂之妻擺蕩於「可嘉」與「可惜」之間，關鍵正在於「助操」的「不明順逆」，侵蝕了其節烈的正當性。不過，王氏特意標舉要「雪君父之大恥」，恐非偶然，考慮到馬超「背父叛君」形象的道德曖昧，雙方的抗衡象徵著「善」與「惡」的犬牙交錯。

在激烈的戰鬥中，楊阜宗弟七人戰死以外，自己亦「身中五槍，猶然死戰」，終於等到夏侯淵支援，趕跑了馬超。楊阜推辭了曹操封侯的獎勵：「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第64回，頁570）毛評不只稱讚：「楊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貢之客並稱」，等於認同其精神可與豫讓以降的「國士」輝映，並說楊阜「可謂操之忠臣」（會評本，頁795、797）。

這位「操之忠臣」還忠直敢諫。第105回曾勸曹叡愛惜民力，勿建造宮苑，³⁹與同樣上表被斬的張茂被贊評評為「如阜如茂，皆非漢之忠也」，而反而是阿諛魏主的馬鈞被「肯定」：「馬鈞才是漢室誅逆的第一個功臣」（會評本，頁1290、1294），其中「忠（功）／逆（過）」的指涉非常耐人尋味：為魏主無私奉獻的忠臣實為漢朝的賊臣；而巧言令色的魏之奸臣，則是漢室中興的頭號忠臣。趙伯陶曾說，人才的善與惡攪擾著作者，使之陷入極大的困惑。⁴⁰姑且不論作者是否真的陷入困擾，但從評點家的意見來看，確實可知其不斷逡巡於「善」與「惡」的界線。楊阜「操之忠臣」的身分畢竟讓毛氏卻步，因此其於第64回總評又反過來說：

楊阜之為韋康報仇，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

³⁸ 如宋俊華：〈《三國演義》的女性價值取向〉，《零陵師專學報》第2期（1998年），頁70-71；楊林夕：〈女性—符號—道德——論《三國演義》中的女性形象〉，《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7期（2009年），頁14-15；孫鑫博：〈毛本《三國演義》「才與節合」的女性觀及其政治文化意義〉，《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8年1月），頁61-62。

³⁹ 此回先有董尋上表勸諫，曹叡雖大怒，但考慮到其「素有忠義」而不願殺之。

⁴⁰ 趙伯陶：〈困惑中的憧憬——《三國演義》的人才理想與作者心態〉，頁92。

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為賊，而不知操之為賊，故揚阜之義，君子無取焉。（會評本，頁 787）

「操之忠」而為「漢之賊」，是小說中最難釋懷的公案之一。貫串曹操一生的典型是曹洪。曹洪在第 6 回救出脫離聯軍，獨立攻打董卓的曹操，並負其渡河，留下「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頁 50）的壯言。毛評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眾將易得，主將難求：為從者萬輩，不若為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此語可垂千古。」（會評本，頁 63）漁評說：「好個曹洪，不從一家起見，卻從天下起見。愚謂天下可無洪，曹操不可無洪。」（會評本，頁 67）

曹洪不僅在滎陽之戰有舉足輕重的表現，在第 58 回曹操被殺得「割鬚棄袍」之際，又是其奮力敵住馬超，助曹操脫困。第 78 回曹操臨終前，曹洪是宗族中唯一被託付後事的將領。曹洪的無私奉獻，獲得了評點者的認可，甚而被與糜夫人、孫策的精神相提並論，⁴¹但其「從天下起見」又不是向著大漢，而是對曹操馬首是瞻，誠為不折不扣的「擇惡者」。

贅評目光如炬，點出「曹洪者，操之忠，漢之賊也」（會評本，第 6 回，頁 68）。歷史的巧合在於曹操不死於亂軍之手，無法博取「忠義」之名，反而一步步走向「漢賊」的道路。小說情節進一步出現反諷，第 14 回先於曹操，作為前導晉見獻帝的正是曹洪：「臣兄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頁 118）以勤王之姿俯首帖耳的曹洪，卻慢慢成為漢賊的幫凶。第 24 回衣帶詔事敗後，曹洪被指派統領御林軍，防察皇族動止；第 80 回更帶劍逼宮，迫使獻帝交出玉璽。當初帶著兵馬跪拜於天子腳下的將軍，最終持刀刃將天子踐踏於腳下，這真是百轉千迴的劇本。

為了使曹家篡奪政權的惡行增添幾分曲折，小說家安排了曹后（曹操之女）

⁴¹ 第 41 回糜夫人望趙雲保護劉禪，勿以己為念，漁評認為「糜夫人此語，極似曹洪言天下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一樣口氣」。（會評本，頁 524）第 32 回毛評以為孫權之佔據東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會評本，頁 397），與曹操開魏，有曹洪捨生忘死的扶持一樣重要。

斥責曹洪為「亂賊」的情節。曹后雖是曹姓，卻忠於炎劉，讓人聯想到早年的曹操也是這樣的「正人」，毛評甚至認為：「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為三云」（會評本，第 80 回，頁 973）——這也與第 119 回司馬孚「臣身為魏臣，終不背魏也」（頁 1054）的宣言照映。相對的，曹操謀臣劉曄是「光武嫡派子孫」，卻終生為「操之忠」，甚至參與了逼獻帝遜位的行動，成漢家帝胄的「漢之賊」（內賊）。⁴²劉曄、曹后、司馬孚，以及第 107 回去魏入蜀的夏侯霸，⁴³諸人各自的選擇，使得「善／惡」不再聚合於一家一姓身上，構成相錯嵌合的板塊。

「操之忠，漢之賊也」，可說是魏之忠臣的最佳註腳。恪守「忠義」雖是一種道德的提煉，但卻殘留下漢道陵遲的餘焦，成為「是」與「非」交纏的氤氳。以此為切入點，這些「操之忠」表現得愈是剛烈，評點者的立場愈是分歧。以龐德為例，此人本是馬超部將，隨主人投靠張魯，但因病留在漢中，不期後馬超又降劉備，龐德輾轉變成張魯手下。馬超大戰曹操時，龐德也參與其中，其武藝令曹操印象深刻。曹操攻打漢中，龐德因讒言為張魯忌憚，被俘後尋思「張魯不仁」而降。龐德之降，以至於後來「擡槩決死戰」，在某些論者看來不失「忠義」，可與黃忠、姜維等人並觀，⁴⁴可是在毛評看來卻不是如此：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阜為康之參軍，而為康報仇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超（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會評本，第 67 回，頁 825）

對毛氏來說，龐德之投向曹操，是比楊阜更卑劣的行為，因為雖然都是臣服於「漢

⁴² 可參見伍大福：〈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頁 8-9。

⁴³ 夏侯霸為曹氏宗親，卻因司馬懿掌握大權而入蜀，被姜維比為「微子去周」，並勉勵其「匡扶漢室，無愧古人」（第 107 回，頁 956），最後果然為了護持蜀漢而壯烈犧牲。

⁴⁴ 如李奉戩、徐依武：〈重評《三國演義》中呂布等人叛降行為〉，《晉陽學刊》第 4 期（1996 年）頁 83；王瑩雪：〈文化視域下的三國降將群——析《三國演義》降將形象的文化意蘊〉，《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 期（2012 年），頁 49。

之賊」，楊阜至少報答了舊主韋康，而龐德則是轉向了舊主的對立面。毛評在第72回又說龐德護衛曹操，力戰魏延的行爲是「忘卻故主，而以操爲吾主，豈不差殺？」（會評本，頁892）儘管言之鑿鑿，但真要說起來，在馬超投奔張魯之後，龐德的「故主」到底要算是馬超還是張魯？當馬超自己背棄了張魯，張魯又歸降於曹操，介於其中的龐德，又到底該如何選擇？毛評並未考慮到這一點，而是繼續批判龐德與關羽爲敵：

馬超既與關公爲一家，而龐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戰馬超無異也。以關公敵馬超猶未爲損重，而以龐德鬥馬超，毋乃爲背主乎？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公，其初何以背馬騰（超）而降曹操？故龐德之死，君子無取焉。（會評本，第74回，頁906）

又諷刺龐德在勢危之際「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頁658）的說法，「此一（二）語在被擒於曹操時何不記之」、「不肯跪關公，獨肯跪曹操，殊無足取」。甚至還爲龐德的擇惡不悛預設了一個可恥的理由：「德之所以不降，想以妻子在許昌故耶？嫂可殺，兄可絕，而妻子獨不可棄耶？」（會評本，頁913-914）事實上，毛評的立場和原來版本差距頗鉅，與贊評的看法也不太一樣，⁴⁵伍大福曾分判二者之不同：

嘉靖本《演義》有詩贊曰：「威武不能屈，節操不能改。生當立金鑿，死尚披鐵鍬。烈烈大丈夫，垂名昭千載。南安龐令明，日月競光彩。」（按：此詩毛本刪）而龐德行軍前向曹操表白：「某自漢中投降主上，每感厚恩，恨肝腦塗地，不能補報；今何疑於德也？……德感大王恩遇，甚過百倍，

⁴⁵ 在贊本及漁本中，龐德曾怒斥關羽：「豎子！何謂降也？吾魏王有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備乃庸才耳，安能及也？吾寧死於刀下，豈降無名之將耶？」顯示出龐德是經過比較與抉擇，認為劉備並非更好的選項，才為曹操付出「忠義」。贊評認為：「雲長欲降龐德，龐德不降，兩兩丈夫，俱堪敬服。」（以上見會評本，頁915-916）

安敢萌異志而負王上也？惟願察之。」……，這段表白贏得曹操「知卿忠義」的讚賞。⁴⁶

上述說法已點出「操之忠臣」的慰藉了，對於這些「擇惡」的「忠義」之士來說，世人要讚賞也好，要批判也罷，這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重點在於其奉獻生命的對象怎麼給予評價。從曹操口中聽到「知卿忠義」，這些戰士們馬革裹屍，報償了恩義，方可了無遺憾，含笑黃泉。

在曹魏陣營中，之死靡他的忠臣還非常多。第 69 回元宵節的政變中，王必雖中箭傷，仍勉力向曹休報告動亂的消息，曹操曾說：「王必是孤批荊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頁 614），果然拼死護持曹操，受到厚葬。第 33 回郭嘉臨死言：「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曹操也哭泣說：「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頁 296-297）這種知遇之恩的場景，堪可媲美白帝城託孤，毛評、漁評卻各自只說了「方哭袁紹是假哭，此哭郭嘉是真哭」、「說真情，又慰眾心，甚妙」（會評本，頁 420）這類無關痛癢的評語，當是一種冷處理，但今人則願意正視這些角色的情操。⁴⁷另外，「過五關斬六將」中的六位將領其實保持了對曹操的忠誠，浦安迪也說這是一群「善良的人」，反而是關羽的行為顯得冷酷。⁴⁸

最後有兩位來自袁紹陣營的人物，恰好一文一武，可為「操之忠」的殿軍，文者是辛毗，武者是張郃，兩人都是在官渡之戰時投奔曹操的，從此成為魏之忠臣。辛毗雖不比郭嘉、荀彧、程昱、賈詡等人活躍，但卻歷仕三代，見證曹魏帝業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其子辛敞在高平陵之變時聽從姐姐辛憲英勸告，⁴⁹奪關向曹爽通報，辛氏的行為被譽為「為臣食祿當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頁 955），可說是「忠義」傳家。至於張郃也是三朝老將，第 101 回時自言：「吾素懷忠義，

⁴⁶ 伍大福：〈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頁 8。

⁴⁷ 如楊旺生把這個例子與諸葛亮、周瑜之鞠躬盡瘁相提並論。見氏著：〈論《三國演義》的知遇之恩〉，《南通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22。

⁴⁸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401。

⁴⁹ 史實中兩人為辛毗之子女，但在小說未特別說明兩代人之關係。

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辭！」（頁 894）最後果然魂斷木門道中，壯烈成仁。

曹魏陣營的忠臣有時讓人歎服，有時讓評點者在「可嘉」與「可惜」之間舉棋不定，有時被冷眼相待，有時被譏為跳梁小丑，但無論是哪一種形象，都是「操之忠」與「漢之賊」交纏的燈芯，用其生命燃燒出光輝的同時，也發出嗆鼻的煙霧。但重要的不是世人如何批判，因為價值觀會隨著立場及時代不斷轉移，有沒有問心無愧地報償了知遇之恩，才是這些忠義之士生生榮辱的依歸。

四、忠義安能事兩朝：擺蕩於善惡的選擇

「擁劉反曹」雖是《三國演義》的基本傾向，但是小說對陣營轉換的善惡標準也並非顛撲不破的。例如張松，第 60 回選擇將西川地理圖本獻納劉備，這樣的行為究竟是倒屣迎賓或引狼入室？漁評的說法相對客觀：「松在玄德為功首，於劉璋為罪魁」（會評本，第 62 回，頁 766）。儘管張松是劉備入主巴蜀的功臣，但仍被視為賣國賊，⁵⁰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其志向的游移——最初張松所尋求的主顧是曹操，但因受到怠慢而轉投劉備。像張松一般擇「惡」但不「固執」的人，並不見得受到改邪歸正的推崇，側面顯示出小說中道德評價的不穩定，筆者在此節將針對這類「曹魏人物」的多元樣貌提出析論。

儘管莊錫華認為在《三國演義》裡，「畏死」與「惜生」是有嚴格的區分的；畏死固然不足為訓，但珍惜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卻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也是作者從容處理三國爭戰中頻繁發生的投降時，獲得巨大張力的根據所在，⁵¹但更多的時候兩者還是被混為一談的。第 85 回故事中，因猇亭之戰蜀軍大敗，鎮守江北的黃權孤立無援，又不肯歸順東吳，遂選擇向魏國投降。劉備雖然對於此事表示理解，黃權也拒絕曹丕封爵的獎賞，顯示出君臣「推誠相信」的可貴，但仍受到小說家

⁵⁰ 如毛評云張松：「偏是賣國之人，反說別人不忠。」（會評本，第 60 回，頁 748）

⁵¹ 莊錫華：〈《三國演義》降者形象的文化解讀〉，《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2001 年），頁 159。

的批判：

降吳不可卻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

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頁 743）

黃權為蜀人，最初是以忠臣之身分登場，曾因勸諫劉璋而摔斷門牙，後來也拒絕拜於劉備，直到劉備親自登門才願意改節。不過，「忠臣」的身分要貫徹始終，確實戛戛乎其難哉。在第 60 回，黃權就曾被與另一位死諫的王累對比：「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頁 532）直到第 85 回終因「堪歎黃權惜一死」而二次易主，得到「紫陽書法不輕饒」的嚴厲批判；然而，若非劉備不顧其勸諫，執意率領前部與吳軍決戰，又怎會逼得黃權腹背受敵呢？

「忠臣」之桂冠有難以承受之重，如果沒有赴死之勇氣，往往無法得體的在勝敗乃兵家常事的世界存活下去。前文提到的龐德固然因「降曹不降漢」而讓毛評譏刺，但同時落入關羽手中而求饒的于禁，也沒有得到較好的評價。第 79 回曹丕有意侮辱于禁，令其整治曹操陵墓，壁上卻「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于禁羞憤身亡，詩歎曰：「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裡描。」（頁 693）可見，魏國人物即使「不忠曹」也不見得是撥亂反正：正因為于禁缺乏為「惡」殉節的勇氣，反而構成道德的缺蝕，讓贊評眼中的「真良將」被貶斥為「真犬彘」。⁵²

于禁的弗克其終，成為令作者感到惋惜的事情，使得「忠義」的善惡標準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這不禁使人疑惑，擺蕩於正統與叛逆之間的人物，到底應該將之對應於對錯尺表的哪一個刻度？《三國演義》中，由劉備麾下而轉投曹魏的，除了上述黃權之勢窮投降以外，最有名的例子是徐庶。

⁵² 贊評在第 16 回于禁整治劫掠民家的青州兵，背負了「造反」的冤枉，但于禁並不急於辯解，反而鑿塹安營，迎戰追擊曹操的張繡，不只獲得曹操稱讚，贊評也認為：「于禁最識大體，只為國家爭勝負，不為一身辨曲直，真良將也。」（會評本，頁 201）然而，在于禁貪生怕死，投降關羽時，贊評又認為：「如于禁者，真犬彘耳，何足言哉！」（會評本，第 74 回，頁 915）

徐庶在第 35 回加入劉備陣營，因屢建奇功而吸引曹操注意，用軟禁徐母的方式招徠。徐庶臨行前以「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第 36 回，頁 321）為誓，在徐母自縊後，雖未自毀諾言，但也不再回到劉備身邊。有論者提到，基於「忠義」觀念，小說中的眾多的叛降者，即使感到新主人並不怎麼賢明，也只有追隨到底了，包括「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徐庶，寧可「一言不發」也不設法逃離曹營，再去投劉備。⁶³第 41 回曹操曾派徐庶招降劉備：

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至，謂曰：「……公可往說劉備：……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徐庶受命而行。……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頁 359-360）

即使徐庶是受到脅迫才與曹操為伍，但仍毅然放棄重回劉備陣營的絕佳機會。曹操「知公忠義」的言辭確實奏效，輿論構成了徐庶行止的枷鎖。儘管是因為詭計而使得徐庶做出「孝」先於「忠」的艱難決定，但既然「孝」的對象已經消逝，徐庶也只能以折衷的方式延續模稜兩可的「忠」：既無益於舊主劉備，亦無損於新主曹操。這位有名無實的「魏之臣」，讓紫陽書法為之擱筆。

黃權、徐庶都因為不得已而屈膝於曹氏，不過也有降於曹魏後又再度反叛的例子，這個人是孟達。孟達在第 60 回登場，與張松、法正合謀迎接劉備入川，後雖屢建功勳，但在第 76 回勸劉封勿出兵援救關羽，埋下了與劉備決裂的種子，第 79 回即聯合申耽、申儀兄弟奔魏。然而，獲得曹丕恩寵的孟達並未死心塌地地成為魏之忠臣，第 94 回其因朝中妒嫉，惴惴難安，透過李豐找上了諸葛亮，申明當初投降是形勢所逼，現在願意響應北伐。諸葛亮不僅接受了孟達的輸誠，並寫了一封書信，開頭說道：

⁶³ 李奉戩、徐依武：〈重評《三國演義》中呂布等人叛降行為〉，頁 84。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頁 836）

孟達最後事敗被殺，但令人好奇的是，如果諸葛亮北伐真的因孟達的內應而成功的話，孟達是否真能由兩番易主的賣國賊，蛻變成「漢朝中興第一功臣」？「忠義」的標準是不是過於低廉了？就像小說家對於黃權所提出的質問：「忠義安能事兩朝？」事實上，諸葛亮不是第一次與「漢之賊」妥協，第 67 回輕易地將關羽口中的「大漢疆土」：荊州三郡交割給東吳；第 98 回甚至令人齎禮物祝賀孫權稱帝。孫吳與蜀漢關係有和有戰，毛評云：

樊城之役，蜀方伐魏而有呂蒙襲荊州之事，是吳乃漢之罪人也。街亭之役，魏方勝蜀，而有陸遜破曹休之事，是吳又漢之功臣也。然非吳之能為罪又能為功也，在乎蜀之能用之耳。武侯唯善用之，故終武侯之世，吳不為罪而但為功云。（會評本，第 96 回，頁 1171）

爲了抗擊曹魏，諸葛亮不斷鬆綁其正統觀的底線，反叛的孟達、僭逆的孫權，都可劃入「功臣」的群體，甚至被賦予「忠義」的評價。職是，「善」與「惡」也隨時在調整彼此的疆界。

耐人尋味的是，孟達重返鄉里的失敗，正肇因於申耽、申儀對於曹魏的掛記。第 73 回「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頁 645），暗示其降劉前本隸屬曹操。後也因兩人的建議，孟達才投奔曹丕，二申亦隨之歸魏。孟達舉事時，申氏兄弟佯裝配合，最終卻怒斥其爲「反賊」，一槍刺孟達於馬下。儘管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兩個合浦珠還的小人物，但說到底這才真的是「忠義之心，不忘故舊」。

儘管有孟達這樣充滿反諷的例子，但評點者基本上還是很願意肯定書中改過自新的行爲。第 28 回毛評論周倉之投關羽：

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

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萑苻，未嘗不可以更新。（會評本，頁 341）

廖化、周倉、裴元紹等人本來是黃巾賊，而黃巾賊正是造成「漢室陵遲，海宇顛覆」的緣由，這樣的身分抵觸了小說中的正統觀，故第 27 回廖化、第 28 回周倉、裴元紹欲投關羽，關羽都不太願意，只勉強接納周倉之附驥尾。然而，廖化在第 60 回再度登場，正是劉備預謀巧取川蜀之際：「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頁 531）劉備沒有經過太多猶豫就收編了這批盜寇——早在第 2 回，劉備就對招納黃巾賊保持開放的態度，⁵⁴ 看來「漢賊不兩立」的標準並非不可撼動的。

廖化、周倉展現出李志宏所稱許的「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⁵⁵ 在小說中算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例子。在第 104 回諸葛亮薨逝前曾提到：「王平、廖化、張嶷、張翼、吳懿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頁 924）除廖化本黃巾外，殿後的張嶷、張翼、吳懿是蜀人，而為首的王平雖說是巴西宕渠人，但第 71 回登場時身分是魏將，曾對曹操說：「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頁 635），後因徐晃不聽忠告而投趙雲，從此忠心於蜀漢，南征孟獲，北討曹魏，任勞任怨，無役不與。由魏入蜀的武將屈指可數，較出名的大概是王平、姜維、夏侯霸，但這些不固執的「魏人」與「黃巾餘黨」、「劉璋舊臣」，卻共同支撐了蜀漢最後的歲月。一如熊篤之比擬：漢朝的功臣蕭何、張蒼、叔孫通都是秦朝的御史、博士、縣吏；陳平、韓信都是項羽的臣僚，若守「從一而終」，這些人都不該輔佐漢高祖定天下。⁵⁶

⁵⁴ 第 2 回黃巾餘黨韓忠等人作亂，劉備隨朱儁圍剿，戰況順利，韓忠打算投降而朱儁不准，劉備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為能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朱儁回答：「彼一時，此一時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頁 12）

⁵⁵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305。

⁵⁶ 熊篤：〈從《三國演義》看「忠」的觀念的沿革演變——《三國演義》倫理觀縱橫談之一〉，頁 57。

漢室興亡之顛末，是非功過之評價如輪軸般不斷旋轉；投曹未必可恥，降劉未必可敬。真要說起來，就連曹操與劉備之關係，也不是那麼壁壘分明。第 73 回劉備自立漢中王，表奏獻帝時提到：「曩者董卓，偽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殲，以漸冰消」（頁 646），其中「群凶」者誰？「忠義」者誰？毛評說：「次敘董卓、催、汜之亂，以下方說曹操」（會評本，頁 897）倘若曹操、呂布等亂臣應該被劃入「群凶」之陣容，以「忠義」自居的劉備，又怎能與「群凶」交好？現在甚至想攫取與曹操一樣的爵位：晉陞為王？

對於劉備的志趣，在第三者看來，與曹操之間並沒有什麼「漢賊不兩立」的堅定立場。從魯肅、顧雍到張昭，作為「崇劉黜曹」外的第三勢力，是超然而冷峻地評價劉備可能採取的選項。⁵⁷毛評雖試圖為劉備緩頰：「玄德自受衣帶詔後，勢不復與曹操合矣。然在東吳揣之，何必不然？」（會評本，第 52 回，頁 644）誠然，「衣帶詔」是曹劉決裂的起點，但歷史上的合縱連橫，卻無一定，例如同樣是受「衣帶詔」的忠臣，劉備就曾與馬超對壘。當諸葛亮或劉備自身立場翻轉的同時，涇渭之水亦為之交匯，然而諷刺的是，紫陽書法的筆誅墨伐，卻只尷尬地落在始蜀終魏的黃權身上。

五、結語

本文以「操之忠，漢之賊也」這樣充滿衝突的評價出發，重新檢視《三國演義》所呈現的善惡意識。繼承毛評「折衷於紫陽《綱目》」的道德評判，學界一般以「擁劉反曹」的取向去理解小說中的是非標準，而雖也有注意到其中反諷筆法的，卻鮮少深入探索書中隸屬於曹魏陣營的忠義之士，如何為「忠孝節義必當

⁵⁷ 第 52 回魯肅勸說周瑜勿破壞孫劉聯盟，除了「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不宜另闢戰場外，還提到了下述之理由：「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頁 453）同樣的疑慮在第 56 回由顧雍再次提出：「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頁 487）第 77 回張昭也如此說道：「今曹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頁 681）

師」的教化觀帶來裂解的可能。

像是徐晃、典韋、許褚、張遼、文聘這樣的忠臣／忠義，之所以願意屈膝於十惡不赦的逆賊，肇因於東漢末年王綱解紐下「擇主」可能性的鬆動。中央朝廷的失能，重演了春秋時代禮壞樂崩的政治環境，準備奉獻忠心的才彥們，也依循聖賢「良禽擇木而棲」的自解之詞，流向地方諸侯的麾下。在其中，曹操身先士卒且知人善任的特質，以及最初號召勤王的「忠臣」身分，會產生磁吸作用其實是很合理的。儘管後來曹操慢慢走往「漢賊」的道路，但是服膺於豫讓「眾人國士」之論的魏臣們，已無可避免地產生「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的死義之心。而在曹操邁向權力腐化的過程之中，荀彧的呼籲頗引人醒目——儘管荀彧的選擇象徵「誤以為漢即是曹」的失敗，但其也未以劉備作為匡扶漢室的較好人選，從後來「皇叔」坐上龍椅的發展來看，確實反過來代表某種悲觀性的洞燭機先。

聚焦於道德評價，曹魏人物的「忠義」表現，常讓評點者陷入「可嘉」與「可惜」的猶豫，如抱持「雪君父之大恥」信念的楊阜，同時又是「操之忠臣」，竟展現出比馬超游走於「背父叛君」或「為孝子而亦為忠臣」形象更純粹的道德高度。還有說出「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的曹洪，被讚為「不從一家起見，卻從天下起見」，然其「天下」又非漢家天下。這位帶軍護駕的忠臣，最終持劍將天子逼下皇位，但也遭受「曹賊」之女的斥責。又如龐德之「降曹不降漢」，也展現出「烈烈大丈夫，垂名昭千載」或「不肯跪關公，獨肯跪曹操，殊無足取」的兩極評價。上述種種，有忠有不忠，但忠者能否就是「善惡可否，皆當如此」的理想解答，恐怕需要多面向的思索。

「操之忠」與「漢之賊」的形象彼此交纏，加以政治局勢影響下的降與叛、和與戰的頻繁變化，善惡標準亦時時在調整，過去的「真社稷臣」轉瞬成為現在的「群凶」；昨天的「魏人」也可能是明日的「大漢棟樑」。魏之忠臣，在大是大非的價值評判上雖不被肯認，但在個體出處擇選上，毋寧是可以理解與同情的，也因此小說中曹操「知人善任」特質的凸顯，才會變得如此重要。當局者迷，旁觀者又何清？縱使受到「紫陽《綱目》」的尖銳批判，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從主公口中得到「知卿忠義」的認可，這才是他們苦苦追尋的生命意義。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

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許麗芳：《章回小說的歷史書寫與想像：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敘事為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日)金文京著，邱嶺、吳芳玲譯，李均洋校：《《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5年)。

(澳)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二) 期刊論文

- 王瑩雪：〈文化視域下的三國降將群——析《三國演義》降將形象的文化意蘊〉，《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2012年），頁48-51。
- 伍大福：〈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37卷第9期（2016年9月），頁5-10。
- 宋俊華：〈《三國演義》的女性價值取向〉，《零陵師專學報》第2期（1998年），頁68-71。
- 李奉戩、徐依武：〈重評《三國演義》中呂布等人叛降行爲〉，《晉陽學刊》第4期（1996年），頁81-92。
- 吳國聯：〈以忠孝仁義爲核心的封建道德觀的頌歌——《三國演義》主題再探〉，《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70-74。
- 胡悅哈、鄒洪峰：〈道德與政治之間——再論《三國演義》的政治思想〉，《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31卷第2期（2011年3月），頁55-58。
- 孫啓祥：〈也說《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塑造〉，《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39卷第1期（2018年1月），頁5-12。
- 孫鑫博：〈毛本《三國演義》「才與節合」的女性觀及其政治文化意義〉，《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8年1月），頁59-64。
- 秦翠紅：〈中國古代「忠義」內涵及其演變探析〉，《孔子研究》第5期（2010年），頁58-62。
- 陳傳席：〈明反曹，暗反劉——《三國演義》內容傾向新論〉，《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00年），頁46-64。
- 莊錫華：〈《三國演義》降者形象的文化解讀〉，《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01年），頁154-159。
- 楊建文：〈還「仁德」在《三國演義》中的地位——兼及跨世紀《三國演義》研究走向的思考〉，《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1996年），頁92-99。
- 楊旺生：〈論《三國演義》的知遇之恩〉，《南通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21-24。

楊林夕：〈女性—符號—道德——論《三國演義》中的女性形象〉，《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7 期（2009 年），頁 11-17。

劉上生：〈《三國演義》「義」文化心理結構之系統考察〉，《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1990 年），頁 69-82。

趙伯陶：〈困惑中的憧憬——《三國演義》的人才理想與作者心態〉，《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1990 年），頁 83-96。

熊篤：〈從《三國演義》看「忠」的觀念的沿革演變——《三國演義》倫理觀縱橫談之一〉，《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0 年），頁 49-57。

聶春豔：〈論《三國演義》的道德化人物形象及其成因〉，《小說評論》第 S1 期（2013 年），頁 98-100。

A Loyal Minister to Cao Cao, but also a Traitor to the Han Dynasty: The “Loyalty” Evalu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f Cao Wei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seng, Shih-H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loyal ministers of Cao Wei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questioning the fin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Under the thought of ‘Support Liu Bei, oppose Cao Cao’, Zhao Yun, Guan Yu and Zhuge Liang dedicating their lives to Shu Han, while Huang Zong, Yan Yan and Jiang Wei defected to Shu Han from their original nations were praised by the novelist and the critics. Besides, should those who contributed to the traitor Cao Cao be called loyal ministers? In Chapter 6, Cao Cao was attacked while he was pursuing Dong Zhou alone and finally rescued by Cao Hong. The critic Li Zhi claimed that Cao Hong was not only a loyal minister to Cao Cao but also a traitor to the Han Dynasty. How to explain the morality of a character who remained loyal to Cao Wei and mutinied against Shu Han under the orthodoxy of the novelist? The author of the novel lamented that such great ministers as Dian Wei, Xu Zhu, Zhang Liao, Pang De and so on were the stalwart supporters to rebels like Cao Cao sugges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morality and loyalty. Thus, the thesis focuses on

how the ministers of Cao Wei in the novel, the critical annotations and the reviews of readers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moral boundaries.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ao Wei, Loyalty, Good and Evil, Marginalia